

# “双边文学关系”的研究范式问题

——兼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

叶 隽

作为科学范式的文学关系研究，实际上是值得追问的。因为一种范式，它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相对普遍有效的研究框架或模型来。由此看来，中外文学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或者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所处理的“中”与“外”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领域，而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故此，我们有必要将命题提高到双边文学关系的层面来考察，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层面和领域。由此所提出的方法和理论，也才具有普遍性。具体操作当然不妨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具体研究做起，甚至作为我们的主要特色，但在范式考虑上应当有宏大的整体视域，应有一个科学性的思维在。这样才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得以很好的结合。

我想，这就要求学界有一个共同体意识，有一个基本的学术伦理观。怎样做才能既做好个体的学问，是有意义的学问；同时又可以在整体上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进步有所贡献？我想以下几点或许值得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学理基础：

一是比较文学的整体学术史意识。进入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诉求很高，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的文化理路，还是人类学的他者视野，不同学科不约而同地都将变路指向了“跨文化”，这充分说明了比较文学的立足点是高明的，而且也是有预见性的，实际上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的兴起，也都可看成是由比较文学衍生而来。以“比较”而立名，关注跨文化现象，比较文学是最早“成体制”的当然，比较文学不仅立于名，而且要善于事。要做到这一点，具体到汉语学术语境，则比较文学必须要有专治外国文学的学者的积极参与，因为没有对至少两种语言文学的深厚功力，只能是“画饼充饥”。当然话说回来，引入比较文学意识，对外国文学学科群的发展来说也极为重要，一则我们可以有一种更融通的眼光去审视外国文学；二则也能主动呼应本国主流学术的若干主题；三则我们可以别出手眼的方式介入到具体国别文学的学术对话中去。譬如我们考察现代德国文学（广义概念）的形成，离开比较文学的眼光怎么可能？因为不仅是德国文学，德国思想史整体也是在一种与异文化（主要民族国家）极为激烈的互动中成型的。这个方面德国学界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譬如德法文学关系、德俄文学关系，他们都有很好的研究。而比较文学的经典同时也就是德国的日耳曼学

的经典，譬如宫多尔夫的《莎士比亚与德国精神》。一方面这类经典著作我们需要引进（介绍乃至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敢于从这个角度切入去研究德国文学（作为异者的研究）。这样的东西能带出我们的“精神根基”，西方学者也会更尊重你。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至少将比较文学史视域里的世界主要文明的形成过程纳入自己的知识与学术视域。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到各民族-国家文学的形成史及比较文化视野的重要建构作用，从这个方面去做文章。从这个方面体现我们的学术优势，至少如“田忌赛马”，可以“扬长避短”。

二是比较文学的思想史高度。实事求是说，就文学谈文学是狭窄的，难得其妙。因为做学问的目的，毕竟不是四平八稳地“做训诂”，虽然考证实证乃是基础性的，但那是必须的“规定动作”，而非取高分的“自选动作”。故此引入思想史的路径是必要的。求学以致思，应当是一个高层次学人自然的学术伦理诉求应该能旗帜鲜明地提出治学不是为了沦为一种工艺，一种求生的手段，而是追求人类的思想的进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如果比较文学真地是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甚至仅仅是“就学论学”的基本规范之中，那么我们所能产生出来的成果，必然会导致其他相关学科的“变动”，道理很简单，中国现代文学离开外来文学与思潮可能会是今天这样吗？虽然有学者强调其传统的现代转化一面，但后者的影响恐怕还是一点不弱吧？但我们做中外文学关系史，做比较文学，在多少程度上梳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此理推广开去，也同样适用。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至少有三个层次可以努力。一是清理最基本的文学史实关系；二是引入具体外来的各主要民族-国家文学的文学史、思想史背景，达致一种诗性文学关系的认知；三是攀升至“诗-思”的思想史高度。如果我们能循序渐进，达到这样的层次，那么，不但中国现代文学史要整体改写或重写，理解世界现代文学史的视域也必将改观。

三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文史根基”与方寸。我始终认为，在人文学科的各学科关系中，史学是根本，文学研究是很难自足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基本方法论（有都是借来的）；而哲学呢？则往往过于缥缈，除了德国哲人的体系性建构，我尚未能见出能自我演绎一套自洽的建构性理论的。所以，采取史学的方法，就比较文学来说，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最擅长的领域自然就是中外文学关系史，但具体领域是一回事，整体论述又是另一回事。钱林森、周宁二位教授做讨论，梳理出“史料-史述-史识”三个层面，这当然有道理。但在我看来，三者并不是可以完全分开成立的，史述的过程就是史料选择的过程，而史料选择见出的就是作者的史实，故此“一字之立，其意多关”。但最为根本的，最基础的，是“史实”，即辨别史实的过程。从这

个角度，葛桂录教授提出一系列关于史料学的建议，我以为是很切中问题的。其它且不论，就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卫茂平教授来撰史，无疑是目前的理想人选。可即便如此，他恐怕还是很难做出来，至少不能做的很好。因为撰史需要学界的一个整体积累过程，不是凭某个学者之天资才情就可达到的。就个中人来说，这仿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本的材料整理收集工作都未系统展开，如何谈到有深度的“史”呢？能理清一个史的基本线索就不错。我们现在该做的恐怕主要还是有个案研究，并努力在个案深入的基础上“以点带线”，能够呈现出某种史述的基本线索来。

此外，关于理论问题，是“创新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迫切关心的问题。譬如就国内来说，大家似乎都有些急于将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定位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学派”的轰轰烈烈，还是方法论的提出尝试，诸如“变异研究”（曹顺庆）、“间性研究”（周宁），都希图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之后确立起一个能具有标志意义的方法论名称。而且客观地说，也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学派这种东西宜于学术史的“事后追认”。“民族自豪感”不可没有，也不可过烈，毕竟，作为学者，宜在学论学，王国维早就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模仿一句：“学有派分也，有高下也。有学科伦理也，凡自立其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其实不值论辩，我倒是倾向于，不妨看看别人的理论发明路径，探讨一下我们面临的、接触到的可能有生发性的点。这样，或许有时可以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

就理论发明的理路来看，西方学界颇有些相关的框架。20世纪的语言学转型是非常重要的；而人类学同样是应当充分关注的学科。但应该不仅仅是两种学科的单纯嫁接，如所谓文学人类学，人类学文学，都似乎比较简单了些。而近来法国提出的文化转移（transfer cultures）、德国学者强调的文化中介（Kulturvermittlung），美国学者总结文化与国际关系（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分析模式，都充分意识到了跨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努力试图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其成败得失且不论，但这样一种努力确实应促使我们在理论上更有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索。

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意义何在？文学的民族主体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怎样在一个宏阔的全球史与侨易学范畴来思考比较文学的意义？我想，一方面比较文学确实有通过他人认识自我的功用，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该否认，它还有着更为宏阔的思想高度追求，就是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歌德19世纪

---

《(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4，载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20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就提世界文学的概念，强调：“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关于其内涵，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史层面去思考世界文学的意义或许是比较文学在“文史根基”立稳之后特别该做的工作。

我们现在虽然讨论的是“中外文学关系史”，但就论述来看，基本上是双边文学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双边文学关系。其实，“间性研究”关注民族主体性问题，有其道理。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生成，往往不仅是在单纯的某种特定双边文学关系的激荡中发展的，譬如现代中国就非常复杂，不引入一个整体性的多边视角，很难解释清楚。那么，多边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则呼之欲出。可多边文学关系怎么做？语言的前提、双边史的积累、核心命题的追问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现在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都在说“话语权”、“走出去”，或许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因素在内，但至少我觉得在学术领域，还是要有“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沉潜心态，学问毕竟是“荒村野老，一二素心人商量之事”。“酒香不怕巷子深”，你真地出现了，学术史不可能忽略你。就像纳什那样，又怎么会怕别人见不到“阳光的美丽”呢？送出去的包装再精致，没有真货，终究也不可能“传之久远”。大潮涌动之中，往往泥沙俱下；但毕竟大浪淘沙，给中国学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当然再追问一层，涉及到兵团作战与单打独斗的问题。即怎样才能真地形成有效性的中国兵团？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在和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很感慨，就是人家基本上是很有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在和具体落实突破的方向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将军，你对战场的全局观要心中有数；而作为一个中下级指挥官（学者），你要知道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应该选择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一个国际学术平台上的，你出来的东西，是逃不出别人的视线的，无论好坏。而且，人家一说，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学术标准”上的。实事求是说，我觉得西方学者这点要比我们强的多，对学术大致还是有一个公允的判断的。

虽然现在学界往往批评比较文学“很滥”，但我觉得这似乎不应该将帽子扣到比较文学的头上，而是研究者本身的问题。这一学科本该是“精英学科”你看看成为大家的那些人物，没有比较意识和眼光的恐怕真地不多。也不是说一般人就不可以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即便外语不好

---

德文原文为：“Nationalliteratur will jetzt nicht viel sagen, die Epoche der Weltliteratur ist an der Zeit, und jeder muß jetzt dazu wirken, diese Epoche zu beschleunigen.” Mittwoch, den 31. Januar 1827. in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198. 中译文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3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也可以做比较文学，但要区分层次，关系到外语是最根本的立身之处的领域你不要去碰就行了。你可以做对外语要求不高的领域，譬如哪怕就是整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材料。你做起来，也是一大贡献，谁能不承认呢？目前的现状，当然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关，做材料、做翻译都不获承认，所以“分工难行”，但光指望制度来造就你，扶持你，那恐怕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只要以学术为本，“天道酬勤”，学术最后还是给予回报的。问题的核心当然更在于，比较文学如何能拿出“过得硬”的东西来？不仅是一个概念，或一些数量，而是真正有思想含量的“硬通货”，比较文学的第一流学者理应跻身于中国学界的领军人物之列，并且能贡献出自己的“学问”和“思想”。这不但是比较文学学科提升自身层次的关键点，恐怕同样是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世界学术殿堂的枢纽处。当然，我们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坐“冷板凳”与“十年磨剑”的坚毅。

从本质上而言，我们现在或许尚远未到达集大成式地撰作《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时代。因为即便就史料收集整理而言，那种系统性的工作都还没来得及做。但话说回来，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使命，一代人亦有一代人之局限。系统性地编撰《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工作无论如何是需要的，哪怕是在基础材料没有足够充分与完备的前提下。我想，就中国学界至今为止的积累和学力而言，我们最多可以说是编个“史料长编”或“史略”罢了。但无论如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初步梳理是极为必要的，这或许是目前出现这套大书的价值。而已有草创性工作的学术程度，当然也会为后来者可以企及的高度提供一种标尺！